

收稿日期:2025-11-02

人工智能赋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内在逻辑与现实理路

李泽浩,段鑫星

(中国矿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作为新一轮技术革命的重要形态,人工智能正在改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环境、传播生态与实践场景。不同于一般专业知识教育,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理想信念教育和价值引领为核心,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思想性、时代性和价值导向性。面对新时代大学生思想动态多元多变、网络生活嵌入度高、个体发展需求突出的现实特征,人工智能可依托数据整合、算法分析、场景生成与反馈评价等能力,为教育者研判学生思想动态、优化内容供给、拓展沉浸式实践场域和完善过程性评价提供支持。与此同时,人工智能赋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并非技术与教育的简单叠加,其实践仍受到主体协同不足、算法价值偏差、数据安全风险与技术替代价值引领倾向等因素制约。因此,应在坚持党的领导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基础上,构建人机协同的数智思政共同体,健全算法监督和数据约束机制,推动人工智能真正服务于大学生价值塑造、能力养成和人格发展。

关键词:人工智能;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引领;人才培养质量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6)04-0105-11

基金项目: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究专项课题一般课题“江苏促进高等教育、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协同发展路径研究”(23ZXZB029)。

作者简介:李泽浩(2000—),男,江苏盐城人,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段鑫星(1964—),女,山西平遥人,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6.04.010

育才造士,为国之本。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发展更加强调质量提升、结构优化与内涵建设。需要指出的是,大学使命并非由“生产、传递高深知识”转向单一的价值塑造,而是在知识生产、知识传授、创新能力培养与品格涵养的统一中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换言之,传授知识、训练思维与涵养品格共同构成培养时代新人的基础路径。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正在于其能够把理想信念教育、价值引领和社会责任培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为知识学习和专业能力发展提供方向性支撑。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指出,要“推进教育数字化,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加强终身教育保障”^[1]。与此同时,《教育

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要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构建固本铸魂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并强调要把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各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和管理体系^[2]。这类顶层设计并非简单要求把技术嵌入课堂,而是要求在教育数字化进程中重建价值引领、知识学习与实践育人的协同机制。由此,探讨人工智能赋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停留于传播效率和技术便利,而应进一步回答人工智能如何回应新时代大学生思想特点,如何服务思政教育的政治性、思想性和价值导向性,如何在具体场景中转化为可治理、可评价、可持续的育人机制。基于此,厘清人工智能赋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逻辑与现实理路,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推动思政教育守正创新的重要前提。

一、 人工智能赋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关联

人工智能深刻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也重塑着大学生成长成才的时代环境。新时代大学生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其学习生活与移动互联网、智能媒介深度交织,信息获取渠道更加多元,价值判断更易受平台算法、网络舆论和多元社会思潮影响,个体发展诉求也更具差异化。对于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引入人工智能不是为了以技术替代教师,也不是把思政教育降格为一般知识训练,而是借助技术更准确地理解教育对象、更及时地回应思想困惑、更生动地阐释价值理念。顺应教育数字化转型趋势,把人工智能由一般工具性技术转化为服务于价值塑造、能力培养和人格养成的“育人工具”,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内在要求。具体而言,一方面,需要通过“将技术转化为教育工具”^[3]推动技术教育化,使人工智能有机嵌入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另一方面,要通过教育与技术的深度融合,使“技术更好地服务教育”^[4],实现教育技术化与价值引领同向同行,进而回答好“思想政治教育为什么需要人工智能赋能”的根本问题。

(一) 人工智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人工智能的传播功能重构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平台与方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对的并非是抽象学习者,而是长期处于短视频、社交媒体、智能推荐和生成式内容环境中的青年群体。其思想动态往往呈现即时性、互动性和差异化特征,传统单向灌输式传播难以充分回应其问题意识与表达方式。第一,人工智能能够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提供平台支持和内容适配能力,通过对学生关注议题、媒介使用习惯和接受反馈的分析,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以更贴近学生经验的方式呈现,增强理论阐释的针对性、吸引力和解释力。第二,智能舆情分析系统能够辅助识别网络空间中的错误思潮、历史虚无主义叙事和极端情绪表达,为辅导员、思政课教师和网络思政工作者提供早期研判依据。但这种研判不应直接演化为对学生的标签化判断,而应服务于有温度的解释、沟通和引导。

人工智能的联结功能则提升了思想政治教育在不同主体、不同场域间的协同效率。思想政治教育的联结功能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信息互通,而是要实现教育目标与学生关切的联结、主流价值与现实问题的联结、课堂教学与网络空间的联结、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的联结。人工智能依托大数据分析和云端协同技术,能够帮助教育者更快捕捉学生在就业压力、社会公平、国际形势、网络热点等议题上的思想困惑,并将思政课教学、主题班会、学生社区、社会实践和网络平台中的育人资源联通起来。借助人机协同模式,教育者与学习者之间的互动得以在更大范围、更高频率上展开,通过分层分类分析实现思想引导的差异化。总体而言,人工智能以内容承载、价值传播和主体联结等多重功能,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增值空间,其“何以要为”的根本依据不在于技术新奇性,而在于其能够更好地服务大学生的价值塑造与思想引领。

(二) 思想政治教育对人工智能的内在需求

人工智能技术功能的实现以大数据、算力和算法三大核心要素为基础,这些要素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同样具有现实需求。但需要强调的是,思想政治教育所处理的数据并不仅是学习成绩、点击频率和课程完成度,更涉及学生的理想信念、价值认同、情感态度和行为倾向等复杂内容。首先,从大数据维度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长期积累了丰富的数据资源,包括学习者的思想动态、价值观念、行为习惯、网络互动以及社会环境等多重影响因素。这些数据规模庞大、维度多元,且具有动态变化和情境关联特征,已经超出单纯依靠经验观察就能全面把握的范围。人工智能的大数据分析能力有助于教育者从分散信息中提炼群体性倾向和阶段性问题,精准识别价值引导的着力点,但其目的应是辅助教育者理解学生,而不是以数据替代面对面的思想沟通。

其次,从算力维度看,思想政治教育在实践过程中需要面对大规模信息处理和复杂思想行为分析的挑战。无论是对网络舆情的实时研判,还是对不同年级、不同专业、不同发展阶段学生思想状况的分层分类分析,都需要较强的计算支撑。长期以来,这类工作多依赖人工汇总与定性判断,容易出现滞后性强、主观性大等问题。人工智能提供的高性能算力和自动化处理能力,能够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对复杂数据的响应速度和处理深度,帮助教育者在主题教育、心理疏导、学业就业指导和网络思政工作中更及时地发现问题、解释问题和回应问题。

再次,从算法维度看,思想政治教育本身蕴含着对象识别、路径推演和结果反馈的工作逻辑。一方面,在教育内容设计与实施中,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根据不同学习者的思想特征、专业背景和发展阶段制定相应策略,这与人工智能的分类、推荐和预测能力具有一定的契合性。另一方面,思政教育强调教育规律、思想政治工作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的统一,不能把算法推荐结果视为价值判断本身。引入人工智能算法,不是简单的“技术嫁接”,而是在坚持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的前提下,放大教育者的研判能力、组织能力和反馈能力。因此,人工智能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而言,不是锦上添花的可选项,而是推动精准识别、因类施教和闭环评价的重要支撑,同时,它必须始终处于人的价值判断和教育责任之下。

二、人工智能赋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驱动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要形态,人工智能在多领域的广泛应用,推动了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的更新,也引发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刻变革。与专业知识教育主要关注知识掌握、技能训练和能力评价不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更强调价值认同、情感共鸣与行为养成的统一,更强调在真实问题和具体情境中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人工智能赋能思政教育不能简单照搬一般课程的智能教学模式,而应围绕思政教育的本质属性和实践场景展开。依靠算法设计、计算能力、数据资源和场景生成等技术优势,人工智能能够在教育者决策、学习者发展、教育场域拓展和教育评价改进等方面发挥作用,为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技术支撑。

(一) 核心算法技术赋能教育者的决策与指导

诚如马克思所言,“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的生产者”^[5],教育活动的实施前提是充分了解教育对象的外在特征与内心世界。对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关键期,又深度嵌入网络平台和社会议题场域的大学生而言,思想政治教育首先需要提升对学生思想状态、现实困惑和价值取向的识别能力。算法技术对大数据的深度挖掘与精准分析,能够帮助思政课教师、辅

导员和班主任更系统地识别大学生的群体特征与个体差异,进而制定更符合学生思想实际的教育方案。具体而言,在传统模式下,封闭单一的信息统计往往只能获得年龄、性别、专业等相对静态的信息,而学生在网络表达、社会议题关注、职业期待和情感压力中的思想状态较难被及时发现。核心算法技术可以通过对课堂互动、网络社区讨论、问卷反馈、主题教育参与情况和社会实践记录等数据的综合分析,形成学生成长状态的辅助性画像,帮助教育者更准确把握学生在理想信念、价值选择、社会责任和发展焦虑等方面的思想状态。需要强调的是,这类画像只能作为教育决策参考,不能替代教师对学生的面对面谈话、价值辨析和情感关怀。只有把算法研判与教师的政治判断、教育经验和人文关怀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精准性和亲和力。

(二) 自适应学习技术赋能学习者的路径与进程

在人工智能场域中,自适应学习是一种基于学习者个体差异和学习需求,为每个学习者提供定制化学习内容和学习路径的学习方式,其强调学习的自主性和个性化,让学习者在最适合自己的节奏和方式下进行学习。自适应学习技术是实现自适应学习的重要手段^[6],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对学习者的学习行为和反馈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从而了解学习者的学习状况、兴趣偏好及知识掌握程度^[7]。但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自适应学习的价值不在于满足个体兴趣偏好,而应是在共同价值目标下根据学生不同的思想基础、现实困惑和成长阶段提供差异化支持。其一,自适应学习技术能够联通思政课程、形势政策教育、党团活动、社会实践和网络思政资源,根据不同年级、专业和成长阶段学生的实际困惑,推送理论阐释、案例材料和实践任务,让学生在自身经验相关的议题中理解抽象理论^[8]。其二,人工智能能够动态记录学习者在讨论、反思、实践和反馈中的表现,帮助教育者判断学习者在政治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和行为自觉上的变化,进而调整教育内容和互动方式。由此,自适应学习对于思政教育的意义不在于制造孤立的个性化路径,而在于在坚持正确价值导向的前提下增强教育的分层性、可达性和持续性。

(三) 虚拟现实技术赋能教育场域的拓展与沉浸

人工智能与虚拟现实技术的结合,为“大思政课”建设和沉浸式价值引导提供了新的场域条件。人工智能教学平台结合虚拟现实技术,能够整合革命纪念馆、基层治理现场、乡村振兴案例、科技创新场景和国家重大工程等教学资源,并通过视觉、听觉、交互任务等方式生成具有临场感的数字环境。遵循理论研究、逻辑校准与沉浸体验的技术路径,学习者通过设备可与虚拟对象交互,获得沉浸式体验,开展虚拟教育实践^[9]。第一,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在横向上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维度。一方面,学生的自主学习不再受制于固定的物理空间,能够通过虚拟现实技术与教师进行跨空间的即时沟通与交流。另一方面,虚拟现实技术的多场景适应性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更加生动与多样化。通过虚拟场景的构建,学生能够轻松切换和自由选择学习空间。可以瞬间“置身”辽沈战役烈士纪念馆,感悟革命精神的伟大力量;“步入”四渡赤水的历史情境,领略战略决策的非凡智慧;“参与”与驻村干部的虚拟互动,体验中国乡村振兴事业的辉煌成就。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打破了传统教育对固定空间的依赖,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灵活性。第二,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在纵向上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时间维度。一方面,学习者的学习时间不再局限于特定的课堂时段,借助虚拟现实技术和智能平台,能够充分利用碎片化时间随时随地访问教育资源,增强学习时间的延展性与灵活性,并提升了学习效率和时间利用率。另一方面,虚拟现实技术通过对学习过程的记录和数据化处理,使教育过程具有历史留

存性与可追溯性。学习行为数据不仅能够被智能技术挖掘与分析,为学习者优化学习路径提供科学支持,还能够通过虚拟场景的时间回溯功能,让学习者“重返”特定历史节点或学习情境,深入理解复杂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强化教育的连续性和针对性,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更加深刻和持久的学习体验。

(四) 大数据技术赋能教育评价的精度与深度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现有评价系统难以满足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涵发展和高质量建设的需求,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价变革必须依托教育数字化转型^[10]。大数据技术为这一过程提供了关键的技术支撑与应用路径,在评估要素、评估过程和评估结果等方面实现了系统优化。第一,评估要素更加全面。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侧重于课堂考核和课后反馈等结果性指标,较少关注思想政治素养的动态变化及潜在发展。基于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的评价系统能够全面采集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行为、情感反应和价值认同等数据,动态追踪其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变化趋势。这样的多维评估体系不仅拓展了评估维度,还能够更精准地反映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认知、情感及行为发展,有效弥补了传统评价的不足。第二,评估过程更加高效。大数据的即时性能够缩短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周期,实现对学习行为和参与度的实时分析,为教师和管理者提供即时反馈。同时,自动记录学生的学习参与情况、课程完成度和互动表现,生成详尽的评估报告,大幅降低人工评估的时间成本。这种实时反馈机制有助于教师精准识别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薄弱环节与需求动态,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从而构建动态优化教育闭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第三,评估结果更加有据可依。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通常依赖教师的经验判断,容易受到评价材料不足、反馈周期较长等因素影响。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评价体系,能够通过数据记录和过程分析,为教师理解学生的学习参与、理论理解、价值辨析和实践表现提供更为充分的参考依据。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可以辅助分析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内容的理解状态,情感计算和行为分析技术也可作为判断其参与意愿和态度变化提供参考。但这些技术结果只能作为教育评价的辅助证据,不能直接等同于学生的政治态度和价值立场。需要强调的是,思想政治教育评价并不是对学生思想状态和价值认同进行简单打分,更不能以算法结果替代教师的政治判断、教育经验和价值引导。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在评价中的作用,应主要定位为过程性、辅助性和诊断性支持,其功能在于帮助教育者发现学生在理论学习、价值辨析、实践参与和现实困惑中的阶段性问题,为课堂讨论、谈心谈话、主题教育和实践育人提供参考依据,而不是形成对学生政治态度和价值立场的刚性标签。

三、人工智能赋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阻碍

前文基于技术驱动和价值功能同构性,阐明了人工智能赋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理路与实践价值。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指出,事物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任何新生事物的发展都伴随着机遇与问题的交织。尤其需要看到,思想政治教育不是一般教育技术应用场景,而是具有鲜明政治性、思想性和价值导向性的意识形态引领工作。人工智能一旦进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就不仅涉及效率提升和工具更新,也涉及价值边界、主体责任、数据伦理和意识形态安全等深层问题。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复杂性与系统性高度融合的综合工程,其多要素间的动态联动与耦合机制在实践中往往受到制约^[11]。因此,必须警惕技术主义遮蔽教育本质、算法逻辑替代价值判断、数据治理弱化主体责任等风险。

(一) 多元主体的协同不足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共同体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而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主体既是最关键、最具活力的要素,也是教育系统中的最大变量^[12]。近年来,以共同体建设为视角推动协同育人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重要发展趋势^[13]。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涉及党团组织、思政课教师、辅导员、专业课教师、家庭、社会实践基地和网络平台等多元主体,存在主体协同缺乏渠道进而造成回应不连续、引导不同步等问题,影响整体教育质量。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入为多方主体协同育人提供了数字化平台,但机遇并不意味着实践能够自动落实。人工智能平台如果缺乏清晰的责任边界和协同机制,就容易成为单纯的信息汇聚工具,难以真正转化为价值引领合力。在具体实践中,家庭、学校、社会之间的协同较弱,主要表现为数据壁垒高筑、系统化协同机制薄弱和协作模式断裂等问题。

第一,数据流通不畅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协同性较弱的核心障碍之一。在多主体参与的教育体系中,数据作为协作的重要纽带,贯穿学生信息采集、群体分析和教育实施的全过程。然而,由于技术壁垒、隐私保护政策以及数据权属争议,不同主体间难以建立有效的数据共享机制。一方面,教师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直接执行者,彼此间数据共享不足,难以全面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与个性特征,影响了教育决策的精准性。另一方面,家庭、学校、教师和社会之间的数据流通渠道有限且滞后,高校掌握的学生思想动态数据难以及时传递给家庭或社会实践单位,制约了协同育人效果的发挥。数据孤岛现象的存在,严重削弱了多主体协同的效率和教育效果,阻碍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闭环管理与精准推进。

第二,系统化协同机制薄弱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缺乏制度性保障。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多主体协同中,制度化、规范化协同机制是关键保障。尽管在政策倡导层面,思想政治教育的多主体协同受到高度关注,但在具体实施中,制度设计却往往流于形式和浅层^[14]。学校层面尝试通过信息化平台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但平台的管理权限、操作流程和数据使用规则等制度设计仍不完善;社会层面对思想政治教育协同机制的重视度不足,相关配套政策与资源支持有限,导致教育主体间的协作呈现碎片化和随机化特征。

第三,高校人工智能赋能水平滞后且区域发展不平衡。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高校是主要场域,但不同地区、不同类型高校在智能化基础设施、平台建设、教师数字素养和技术服务能力上存在差异。《2022人工智能教育蓝皮书》指出,东部地区在智能化设施建设、工具应用及学生智能体验感知方面显著领先于西部地区。这种不平衡不仅是技术条件差异,也会进一步影响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可及性与公平性。资源较弱高校可能难以建设高质量网络思政平台、虚拟实践场景和数据分析系统,导致学生接触优质思政资源的机会不足;资源较强高校则可能在技术迭代中不断积累优势,形成新的“数智鸿沟”。这种区域和校际差距削弱了多主体协作效率,也制约了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推进。

(二) 算法技术的偏差误用

人工智能算法在教育领域具有广阔应用潜力,但其内在偏差和伦理问题日益凸显。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而言,算法风险不仅表现为一般教育场景中的教育不公,更可进一步影响价值判断、政治认同和意识形态安全。推荐算法可能固化用户印象,限制自主选择,引发认知偏差;算法偏见可能加剧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扩大“数智鸿沟”;生成式人工智能还可能输出错误史实、片面观点或价值导向不清的内容,削弱思政教育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这些问题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方向、教育公平和育人实效构成挑战。

第一,推荐算法固化用户印象。算法本质上并非完全客观或中立,其设计和运行始终服务于特定目标,这些目标往往隐含设计者的价值取向。推荐算法通过设定筛选和推送机制,构建“个性化”智能推荐模式,将用户感兴趣的内容精准推送。对大学生而言,这种机制虽然提高了信息获取效率,却可能形成“信息茧房”,使学生反复接触与既有偏好一致的观点,减少了与不同立场、复杂现实和严肃理论对话的机会。若思政教育平台过度依赖推荐算法,可能把学生的短期兴趣误认为真实需求,把点击偏好误认为价值认同,进而削弱思政教育应有的理论深度和问题引导功能。教育者若对算法逻辑理解不足,也可能把智能推荐结果视为唯一客观答案,导致教育活动单一化、模板化和技术依赖化。

第二,算法偏见加剧教育不公。算法依托大数据资源,在数据筛选和处理过程中可能会过滤掉少数群体或异常数据,导致结果狭隘化,进而强化既有偏见和刻板印象,威胁教育公平^[15]。在思想政治教育场景中,这一问题还表现为对学生思想状态的标签化和静态化。例如,某些学生因较少参与线上互动,表达方式较为含蓄或对热点问题持有疑问,就可能被算法误判为“低参与”或“低认同”。这种误判一旦进入管理和评价环节,就可能影响教师对学生的真实理解,甚至造成新的教育不公平。再者,人工智能算法依托海量数据、复杂模型和精准算力,使经济欠发达地区高校难以与资源优势地区高校竞争,从而扩大了区域和校际技术差距,固化“教育鸿沟”。已有研究表明,大语言模型生成内容存在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案例,但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仍然有限,多将生成式人工智能视为课堂教学的辅助工具^[16],未能充分认识其可能带来的教育模式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这种忽视进一步加剧了教育不公。

(三) 数据安全的保障缺失

人工智能技术因其复杂的算法机制,常面临数据处理透明度不高的问题。算法运行过程及其结果难以解读,增加了监管难度。此外,若算法在自动抓取或爬取数据时涉及个人信息,将直接威胁数据主体的隐私权,构成潜在的侵权风险^[17]。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而言,数据安全问题尤为敏感,因为相关数据可能涉及学生的思想状况、政治态度、心理状态、社会关系和行为轨迹等内容。如果缺乏严格边界,技术赋能可能由精准支持滑向过度采集和过度干预,对教育信任关系造成损害。

第一,教育数据侵权风险。大数据技术需要收集和处理学生的个人数据,包括学业信息、行为轨迹、心理状态、兴趣爱好和平台互动等。这种数据收集若缺乏透明性,或未获得学生充分知情同意,就可能侵犯学生隐私权。一些教育平台通过隐性授权条款收集超出教育需求的敏感数据,如生物信息、地理位置和社交关系,容易造成信息控制权弱化。对思想政治教育而言,风险还在于学生可能因担心表达被记录和评价而减少真实交流,进而削弱思政教育赖以展开的信任基础。再者,数据共享边界不明确也会加剧侵权风险。教师上传的教学资源或学生提交的学习成果若未经授权就被搬运、复制或商用,不仅侵犯教育主体的知识产权,也损害智能化思政教育的伦理基础和合法性。

第二,教育数据监管风险。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数据监管风险贯穿数据输入与输出全过程,面临技术框架复杂与监管体系不完善的双重困境。在输入阶段,依托海量用户数据的大数据技术通过复杂算法进行分析,这些数据不仅精准详实,还涉及个体生活的多维度细节^[18]。如果数据采集渠道封闭、授权机制模糊、用途偏离初衷,监管难度将明显增加。近年来,网上考试资料泄露、学生学习平台数据非法利用等事件暴露了数据输入环节监管的薄弱。在输出阶段,教育数据的合规性与价值导向同样面临挑战,尤其容易受到商业流量逻辑和平台利益驱动影响,可能会推送价值导向不清、事实依据不足或意识形态风险较高的内容。对处于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塑造关键期的大学生而言,这种风险可能造成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失真,阻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培育。

四、人工智能赋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化路径

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既面临技术、伦理与制度等多重挑战,也为强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时代性、人民性和实践性提供了新的契机。破解困境的关键,不是把人工智能作为外在工具简单叠加到既有工作流程中,而是在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根本立场的前提下,围绕大学生思想特征、思政教育实践场景和学科本质属性重构技术应用逻辑。具体而言,应坚持教师主导与技术辅助相统一、价值引领与精准服务相统一、数据治理与人文关怀相统一,使技术优势真正转化为育人优势、治理优势和价值优势。

(一) “数智思政”:加快育人合力的形成

第一,提升教育者的数智思政素养,构建以数字素养培育为导向的教学共同体。推动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首要在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能否用好、管好、讲好人工智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19]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不仅要熟练掌握智能平台的基本操作,更要具备用人工智能讲道理、讲政治、讲现实问题的能力,把技术优势转化为课堂话语优势和价值引导优势。一方面,高校应通过专题培训、案例研修和实践共同体建设,提升思政课教师、辅导员和党团干部对算法逻辑、平台规则、数据伦理和意识形态风险的理解水平,使其在教学设计中主动调用智能工具,而不是被动追随技术。另一方面,应在课程体系与日常教育中融入媒介素养教育、数据素养教育和算法素养教育,引导学生正确使用人工智能,辨析生成式内容,抵制错误思潮,把“带着价值观用技术”的能力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育人成效。

第二,健全家校社协同的数智支撑体系,打牢协同育人的制度根基。在具体实践中,家庭、学校、社会之间的协同较弱,数据孤岛和机制断裂现象突出,削弱了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效能。为此,应在国家顶层设计、高校内部治理和社会参与机制三个层面协同发力。在国家层面,可通过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和“三全育人”综合改革,将思想政治教育智能化建设纳入相关规划,鼓励不同地区、不同类型高校因地制宜地推进数智思政平台建设。在高校层面,要依托校园数据中心和一体化管理平台,把思政课教学、网络育人、校园文化、党团活动、心理支持和社会实践等多元数据有机汇聚,形成服务学生成长的授权化、分级化、可解释的支持系统,而不是单纯的监测系统。在社会层面,可通过与社区、企事业单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社会组织等共建共享数字化实践基地,借助智能平台实现校内外、线上线下思政资源联接,推动形成“学校主导、家庭配合、社会支持、平台赋能”的多元协同育人格局。

(二) “算法监督”:加快法律规范的健全

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广泛应用离不开科学有效的算法监管。算法监管的完善既是防范技术风险的现实需要,也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公平和学生权益的战略需求。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而言,算法监督不能仅停留于技术合规层面,还必须关注算法输出是否符合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是否尊重学生的成长规律,是否维护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只有在法律保障、伦理规范和人才支持的共同作用下,才能为人工智能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第一,增强对人工智能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监管能力。首先,要明确算法监管的核心范

围和实施标准,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属性和价值导向。针对人工智能技术在课程推荐、学习诊断、舆情研判、虚拟实践和评价反馈等环节的应用,监管标准应覆盖从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内容生成到结果输出的全过程,确保其符合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国家和高校应进一步明确人工智能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边界与伦理规范,对数据采集范围、使用目的、算法透明度、结果解释和责任承担作出更具操作性的规定。其次,应建立动态评估机制和透明公开制度。针对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快、场景更新快的特点,通过定期评估、第三方审查和师生反馈等方式,对算法模型的价值偏向和风险隐患进行持续监测,通过发布算法应用说明、健全信息披露机制等方式,提升算法治理的公开性和可问责性。

第二,结合传统教育治理经验进行具体规制。一是借鉴传统教育在课程内容、教材使用、课堂管理和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等方面形成的成熟经验,构建算法输出内容的审查机制,防止智能推荐绕开既有的内容把关程序,确保推送给学生的内容符合国家教育方针和主流价值导向。二是针对新兴问题制定前瞻性法律与校内制度。对于算法歧视、标签化推荐、信息茧房、生成式内容失真等风险,应明确算法设计必须遵循公平、公正、非歧视和可解释原则,防止技术放大原有社会不平等和教育不公平现象。三是区分专业知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算法应用边界。专业知识教育可以更多地依赖知识掌握度诊断和技能训练反馈,而思想政治教育涉及价值判断与政治方向,必须保留教师审核、人工复核和申诉纠错机制,防止算法直接决定学生评价结果。

第三,构建高素质专业队伍,夯实算法监督的能力基础。一方面,要提升立法、执法和高校管理人员的数字素养,使相关人员既理解人工智能的技术逻辑,又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逻辑,在规则制定和治理实践中实现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另一方面,要提升技术开发人员的法律、伦理和思政素养,通过专门培训、行业规范和校企协同治理,强化其对数据保护、算法公平性、意识形态安全和教育伦理的认知,引导开发者在算法设计之初就嵌入育人导向和底线思维。通过多方协同,构建覆盖立法、执法、司法、教育管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和技术开发等环节的算法监督共同体。

(三) “数据约束”:强化信息体系的完善

在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中,数据的规范使用与保护是关键所在。为有效应对数据安全风险,必须加强数据约束机制,通过强化数据治理体系、优化技术应用策略和提升信息保护意识,全面保障数据的合法性、合规性和安全性^[20]。同时应看到,思政教育数据与一般学习数据不同,往往关联学生的思想动态、价值态度、心理状态和社会关系,因此更需要坚持最小必要、明确授权、分类分级和目的限定原则。

第一,完善数据治理体系。一是健全数据治理相关法律法规和校内制度,构建覆盖数据采集、存储、处理、共享、删除和追责全流程的规范框架,为思想政治教育数据治理提供明确依据。特别是在涉及学生思想状况、政治认同、心理状态等敏感信息的场景中,应明确数据使用权限与范围,坚持最小必要原则,避免把学生日常表达和思想困惑过度数据化。二是构建多方协作的治理机制。推动政府、高校与技术企业协同制定并执行数据治理规范与标准;在校内要明确党委统一领导下的责任链条,强化对思政类数据平台的统一管理、权限分级和过程审查,并建立学生知情、反馈和纠错机制,通过公开透明的方式提高数据治理的可信度。

第二,优化数据保护技术策略。一是采用先进的数据加密和隐私计算技术。利用多层加密算法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涉及的数据进行保护,确保数据在传输和存储过程中的安全性;引入联邦学习、差分隐私、去标识化处理等技术,在保障数据分析有效性的同时,降低数据泄露风险。二是完善数据安全防控体系。加强教育领域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数据防火墙、入侵

检测系统和日志审计机制,重点防范对思政教育平台、学生成长档案和网络思政系统的恶意攻击。三是建立动态数据监测与风险评估机制,定期检查数据采集是否超范围、算法调用是否合规、平台输出是否存在价值偏差,全面提升数据保护能力。

第三,强化数据保护意识。一是提升教育者的数据安全意识。通过定期培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者对数据保护重要性及相关技能的理解,促使其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在线问卷、心理测评、舆情研判和学生成长档案建设等环节中合法、合规、审慎地使用数据。同时,加强教育管理部门监督,促使教育者自觉遵循数据保护规范^[21]。二是增强学习者的数据隐私意识。将数据隐私保护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和校园文化建设,通过案例教学与实践活动,提高学生的数据保护能力与风险意识,引导学生形成对个人数据的主动管理意识。三是把信息权利教育与国家安全教育、网络文明教育结合起来,引导学生把对自身信息权利的自觉尊重转化为对国家数据安全和网络空间主权的自觉维护。

综上所述,人工智能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是数智时代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守正创新的重要方向。通过从学生思想特征、思政教育本质属性和技术赋能机制三个层面重新审视其内在逻辑,可以更准确地理解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价值与发展边界。人工智能能够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精准性、互动性和场景化水平,但其价值并不在于替代教师、替代判断或替代价值引领,而在于辅助教育者更好地把握学生成长规律,更有效地回应学生思想困惑,更生动地阐释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和中国制度。无论人工智能技术如何演进,其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应用都必须始终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根本立场,牢牢把握立德树人的核心任务。唯有在政治方向、教育规律和技术治理之间形成稳定平衡,才能在保障教育本质的前提下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智能化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2024-07-19(1).
- [2] 中共中央,国务院.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EB/OL]. (2025-01-19)[2026-04-28]. <https://www.news.cn/politics/20250119/f33c2caa323249ca8fd2038515ee9620/c.html>.
- [3] 陈晓珊,戚万学.“技术”何以重塑教育[J]. 教育研究,2021(10):45-61.
- [4] 陈姝伊. 守正创新: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变”与“不变”[J]. 机械职业教育,2023(11):33-38.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52.
- [6] Education Growth Advisors. Learning to adapt: a case for accelerating adaptive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R/OL]. 2013-03-13. https://tytonpartners.com/app/uploads/2015/01/Learning-to-Adapt_Case-for-Accelerating-AL-in-Higher-Ed.pdf.
- [7] 高虎子,周东岱. 自适应学习系统学习者学习风格模型的研究现状与展望[J]. 电化教育研究,2012(2):32-38.
- [8] 余胜泉. 人工智能+教育蓝皮书[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196.
- [9] 王佳杰,石伟平. 数智时代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模式变革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J]. 教育与职业,2024(23):47-53.
- [10] 赵丽涛,于露远.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评价及其优化路向[J]. 思想理论教育,2023(5):26-31.
- [11] 王管.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构建的逻辑理路与实践创新[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4(11):131-136.
- [12] 陈波.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合力出场的学理思考[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4(18):22-25.
- [13] 张明霞. 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构建的三重维度[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4(10):33-36.
- [14] 刘邦奇,吴晓如. 中国智能教育发展报告[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12.

- [15] 冯永刚,赵丹丹. 人工智能教育的算法风险与善治[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2(7):88-95.
- [16] 邓伟,杨晓丹,高倩倩,等. 人工智能支持下的课堂教学评价模型研究[J]. 中国教育信息化,2023(8):3-14.
- [17] 齐延平,田奥妮. 司法数字公开中个人信息隐私保护的“整体一责任”模式[J]. 中国法律评论,2024(4):102-113.
- [18] 丁汉文,聂奕懿. 人工智能赋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探析[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4(8):72-74.
- [19] 习近平. 论教育[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188-189.
- [20] 谢娟. 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创新何以“伦理先行”:兼论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伦理路径[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24(6):11-19.
- [21] 赵磊磊,吴小凡. “智能+教育”场域下数据治理的挑战与应然取向[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6):115-120.

The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ways of AI Empower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LI Zehao, DUAN Xinxing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 Manage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Jiangsu, 221116, China)

Abstract: A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reshaping the teaching environment, communication ecology and practical scenario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Unlike teaching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with ideal and belief education and value guidance at its core. It is characterized by distinct political, ideological, contemporary and value stance attributes. In the New Era, university students exhibit diversified and volatile mindsets, deep engagement in digital life, urgent demands for person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se characteristics, we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AI to provide support for educators in identifying students' mindsets, optimizing teaching content, expanding immersive practice scenarios and improving formative assessment, through data integration, algorithmic analysis, scenario generation and feedback mechanisms. However, it is not a simple combination of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which is still constrained by insufficient coordination among multiple actors, algorithmic value bias, data security risks and tendency of technology overriding value guidance. Therefore,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Party's leadership, fulfill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building the digital-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mproving mechanisms for algorithmic supervision and data governance,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I for the cultivation of value, competence and personality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value guidanc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责任编辑:朱 根]